

理查德·霍加特与文化研究的进路

——以《识字的用途》为中心

庞 弘*

摘 要 在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理查德·霍加特是一位极具分量的人物。作为霍加特影响深远的著作，《识字的用途》从多个向度昭示了文化研究的进路。首先，基于对工人阶级生活中“诗意的粗鄙”的描绘，霍加特凸显了文化研究对日常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其次，通过对历史演进中“闪光的野蛮”的揭示，霍加特为文化研究对变迁社会中个体精神困境的书写奠定基调。最后，借由对“读书识字之用”的追问，霍加特释放了文化研究的反思意识与批判潜能。尽管《识字的用途》尚存在某些悖论或未完成性，但于当下中国之文化研究，霍加特所开启的进路仍将带来不容忽视的启迪和镜鉴。

关键词 理查德·霍加特 《识字的用途》 文化研究 工人阶级 大众文化

Abstract In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of cultural studies, Richard Hoggart is undoubtedly a very important scholar. As Hoggart's far-reaching work, *The Uses of Literacy* shows the paths of cultural studi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Firstly, based on his depiction of the “poetic vulgarity” of working class life, Hoggart emphasizes the focus of cultural studies on every-

* 庞弘，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和视觉文化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阐释的边界’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重估研究”（项目编号：18CZW00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9ZDA269）的阶段性成果。

day experience and “local knowledge”. Secondly, by revealing the “shiny barbarism”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oggart initiates the writing of individual spiritual dilemma in a changing society in cultural studies. Finally, by inquiring into “the use of literacy”, Hoggart releases the reflective consciousnesses and critical potentials of cultural studies. Although *The Uses of Literacy* has some paradoxes or unfinished characters, but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aths Hoggart has pointed out will still bring implications and lesson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class; popular culture

自世纪之交以来,在无数知识人的参与下,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已愈发稳固。在文化研究斑斓的知识谱系中,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是一位具有坐标意义的人物。作为20世纪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以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最重要缔造者之一,霍加特通过孜孜不倦的思索与建构,为文化研究确立了最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理论范式。然而,较之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尔(Stuart Hall)、汤普森(E. P. Thompson)等“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先驱,霍加特在中国的关注度却稍显不足。2020年,由阎嘉教授翻译的霍加特代表作《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将使霍加特对文化研究的贡献得到更多国内学者的瞩目。

《识字的用途》初版于1957年,很快便在欧陆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被公认为文化研究中最具元典意义的著作之一。有学者指出,该书同威廉斯的力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一道,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它永远地改变了文化分析中值得关注的焦点。”^①《识字的用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论,而是以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体写成的。全书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霍加特回顾了“旧”秩序下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图景;在第二部分中,霍加特则以警醒的姿态,展现了“朴素又健康的旧态度”^②是如何在文化的变迁中背腹受敌的。虽然

① Sue Owen ed., *Richard Hogg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20,第62页。

距初版已逾 60 年，但《识字的用途》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于今日之文化研究依然不无启发。借用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说法，倘若“当下”意味着对一切既往事实中“未被经历之物”的揭示，^①那么可以说，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所描绘的人们“曾经拥有”的经验，所开辟的诸多业已为经验证明的研究路径，就仍将在这个嬗变中的“当下”不断被重新发现，不断衍生出值得玩味的新的可能。

一 “诗意的粗鄙”：工人阶级经验的追忆与书写

纵观《识字的用途》一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民族志”（ethnography）式考察。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的知识话语中，工人阶级所充当的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他们虽然占据了最大的人口比重，并支撑起整个社会机体的有序运行，但常常被正统的学术研究弃若敝屣，甚至被部分精英人士贬抑为一帮“想起哄就起哄，想恫吓就恫吓，想砸烂就砸烂”^②的乌合之众。作为出身于穷苦工人家庭的大学教授，霍加特对自己生长于斯的群体怀有深切眷恋。在《识字的用途》中，他聚焦于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的工人聚居区，以一位亲历者的身份，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人阶级生活加以倾情追忆与细致书写。在他栩栩如生的笔触下，彼时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工作方式、家庭关系，乃至闲谈、娱乐、消遣、迷信、神话、笑话、趣闻、信仰、玩笑、俚语等竞相跃然纸上，叫人颇有些“重返历史现场”之感。当然，霍加特的目标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试图说明：工人阶级并非呆滞、麻木的“文化白痴”，相反，在这一历久弥新的群体中，同样沉淀着独特的思维习惯、精神气质和“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换言之，在工人阶级身上，或许携带着粗陋、鄙俗的因子，但这恰恰是一种可贵的、充满诗意的粗鄙，它蕴含着自成一格的品格与力量，而无法被任何狭隘、偏执的理论话语所轻易遮蔽。

《识字的用途》第一部分名为“‘旧’秩序”（An ‘Older’ Order），在该部分中，霍加特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工人阶级所具备的诸多美德，如勤勉、坦率、坚韧、乐观、开朗、宽容、风趣、热爱生活、重视当下、待人如己、

① [意] 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 33 页。

② [英]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8，第 45 页。

同舟共济,等等。以上种种,无不流露出来自民间的勃勃生机,而令浸淫于工具理性的当代人相形见绌。进一步,霍加特将家庭和邻里指认为工人阶级价值观的枢纽所在。他发现,在绝大多数英国工人的心目中,家庭是“一种建立在关心、友爱、小群体感觉基础上的生活”,它固然显得散乱无序,却往往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单纯、无意识、却仍然强烈的感觉的保证”。^①相应地,邻里则意味着“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生活,其中的一切都非常亲近”^②。这种黏稠的人际关系尽管与破败、阴暗、贫瘠相伴,但同样不乏刺激和新鲜感,并基于距离的接近而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共同体意识。正是对家庭和邻里的敏感,促使工人阶级将“我们”和“他们”截然区分,对同属于一个社群的“我们”友善相待,对“我们”之外的“他们”则持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由此,霍加特得出结论: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是一种自足、自洽的内生性文化,它由“密集而具体的生活”所孕育,并专注于“亲密、感觉、细节和个人”。^③这种充满韧性、不断延展的文化,一方面使工人阶级获得直面生活的勇气,另一方面又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精神庇护所,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免于外部力量的干扰与侵袭:

在关于“反应迟钝的广大平民百姓”的讨论中,可能存在着某种预见性的真理。但是,迄今为止,工人阶级民众并没有像那句话使人想到的那样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就他们自己的很大部分而言,他们“并不在那里”,他们生活在别处,凭直觉、习惯、言词活着,借助神话、格言和仪式活着。这使他们不会受到当下态度的某些最坏的影响……^④

鉴于此,霍加特宣称,工人阶级绝非“没有文化”的庸碌之辈,他们的文化自成体系,生意盎然,一旦浮出水面,足以使任何对其漠然以待的知识人倍感震撼。上述论断无疑为当时“沉默失语”的工人群体提供了自我言说的宝贵契机。

借由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深度开掘,霍加特将日常生活这一重要纬度引入了文化研究中。长久以来,在人文学术场域中,文化被理解为一种完美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73~74页。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94页。

③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140页。

④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66页。

而纯粹的精神产品，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庙堂之物。阿诺德（Matthew Arnold）有言，文化意味着“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无愧于“美好与光明的真正源泉”。^① 利维斯（F. R. Leavis）则指出，文化的最核心要素，是包括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D. H. 劳伦斯在内的小说巨擘所书写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② 相较之下，霍加特体现出强烈的底层意识和俗世情怀。在《识字的用途》中，他以“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心态，细致描画了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诸种细节，如“从报纸包装中散发出来的炸鱼和薯条的味道”“地方公共图书馆的氛围”“硬薄荷糖的味道”“混杂着烤牛肉味的星期天《世界新闻报》”“家庭（在日子不错时）的温馨和‘令人窒息的关注’”“投币供电系统”“工人阶级父亲在思考时抓耳挠腮的样子”“犒劳‘救世军’的传统”等。^③ 这种巨细靡遗的日常书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使之超越纯然的精英文本，深入工人阶级质朴、本真的生活经验，从中发掘出更微妙、深邃的精神内涵。正是在霍加特的推动下，日常生活才不再是难登大雅之堂，而是真正进入了正统学术研究的殿堂之中。《识字的用途》问世 60 余年来，霍加特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威廉斯谈道，文化是“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④。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文化是包括“感情、关系、记忆、亲情、地位、社群、情感满足、智力享乐”在内的“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⑤ 美国学者本·阿格（Ben Agger）更是坦言：“文化不只是高雅文化作品和知识的贮藏库，而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学识和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人类学整体。”^⑥

在突破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同时，《识字的用途》还彰显了文化研究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诉求。众所周知，当代人文学术在“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法则的驱使下，往往孜孜不倦于对“大叙事”（grand nar-

① [英]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第 35 页。

② [英]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第 3~4 页。

③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3 页。

④ [英]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 4 页。

⑤ [英]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 151 页。

⑥ [美] 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张喜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 100 页。

rative) 进行建构,即试图以一种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模式,对纷繁多样的文化现象加以统揽天下、不容辩驳的诠释。殊不知,此种研究理路,一方面抹杀了差异性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一种危险的阶级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性别中心主义倾向,很容易畸变为独断专行的话语暴力。故而,对地方性知识的发现,便成为对抗大叙事之威权的有效策略:“所谓地方性的知识,是相对于总体性的和普遍性的知识而言的。地方性就是局部性,它表征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观念,亦即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文化观的深刻质疑,强调的是具体的语境化研究方法,而非超越时空具体性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① 细读《识字的用途》一书,不难发现,地方性知识俨然成为霍加特一以贯之的立足基点:一方面,他摆脱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傲慢和自恋,对长期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群体投以关注目光;另一方面,他又秉持一种“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研究策略,将工人阶级文化指认为一个在动态情境中不断演变的微妙过程,以揭示其隐微难察的构造形态和表意路径。霍加特的研究思路,无疑有助于颠覆主流学术话语中的普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为一种多元、小写、复数的地方性知识提供生长空间。

二 “闪光的野蛮”:变迁视域下的个体精神困境

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并未止步于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共时性考察,而是展现出一种动态的研究视域。在该书第二部分“为新的让位”(Yielding Place to New)中,他试图将工人阶级文化置于“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s)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论及社会变迁,想必不少人对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这段妙语记忆犹新:

如果我们把迄今为止人类存在的全部时间跨度想象为1天24小时,那么农业诞生于这一天的23点56分,而文明则出现在23点57分。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始自23点59分30秒!然而人类在这一天的最后30秒内发生的变化,却可能与此前所有时间内发生的变化一样多。^②

① 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56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6页。

作为这激动人心的“最后30秒”上的一个节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无论政治局势、经济制度，还是文化政策，都显示出诸多不同以往之处。相应地，较之20世纪30年代的“旧”秩序，英国工人群体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情感体验，同样发生了激进而意味深长的改变。^①霍加特的着力之处，恰在于对彼时工人阶级生活中的“不同之处”予以揭示。他坦言，《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关注“一些古老因素在工人阶级生活中持续存在的方式”，而第二部分则聚焦于“当代生活的一些特征，它们似乎要鼓励工人阶级民众采取不同态度或者改变旧的态度”。^②

按照最普遍的理解，20世纪30~50年代的社会变迁改善了英国工人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离开破旧的聚居区，搬进相对舒适的公寓，并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更多福祉。然而，霍加特宣称，自己致力于考察的是“变化的令人遗憾的方面”^③。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隐含着一种粗糙的进步论倾向，即想当然地认为，凡是新的便是好的，凡是不同于过去的，便是值得钦慕和推崇的。上述倾向若泛滥无度，将使人们陷入唯新是从的怪圈中，而忽视进步所衍生的诸多负面效应：“要‘入时’，要‘拥有最新的’，因此变成了要拥有最好的。……时尚满载着仙境中的野蛮人，无法抗拒地前行；不是前往任何地方，只是为前进而前进。”^④霍加特进一步强调，英国社会在3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与其说是令人欣喜的积极征兆，不如说是引人深思的“闪光的野蛮”，在它光彩熠熠的糖衣之下，掩藏着诸多难以察觉的文化症候与精神危机。在此，霍加特似乎延续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历史哲学论纲》（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中对历史无限进步之“神话”的审判。

霍加特承认，较之工人阶级在生活条件、健康状况、消费水准、教育机会等方面的改善，更值得侧目的是“伴随着那些变化的文化上的危险”^⑤。基于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试图勾勒工人阶级在社会变迁中的精神

① 关于工人阶级社区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出现的变化，详见〔英〕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352~397页。

② 〔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209~210页。

③ 〔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210页。

④ 〔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234~235页。

⑤ 〔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376页。

图景。需要注意的是,霍加特并未满足于泛泛之论,亦未以抽象理论对生动的经验事实加以裁剪;相反,他总是从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真实细节出发,通过对一系列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如实呈现普通人在“闪光的野蛮”笼罩下所产生的迷惘、焦虑、困顿和纠结。沿用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的说法,霍加特所彰显的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即“把个人的、自传性的问题与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直接联系起来”^①,从无数英国工人感同身受的困境中窥见社会变迁所投下的浓重阴霾。

在探讨变迁视域下的个体精神困境时,霍加特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两类工人阶级青年形象。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那些成天泡在街头奶品店,靠投币式自动点唱机消磨时光的“点唱机男孩”(Juke-Box Boys):

他们穿着悬垂式套装,戴着花领带,一副美国人懒散的样子。他们多数人都买不起一杯接一杯的奶昔,而是沏几杯茶喝上一两个小时——这是他们来这里的主要原因——他们把一个又一个铜币投进机械式点唱机。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大约一打唱片;按一个编号按钮就得到一张想要的唱片,挑选唱片是根据按钮与标题的对应。租赁公司大约每隔两周更换一次唱片;几乎所有唱片都是美国的;几乎所有唱片都是“唱歌的”,演唱风格比通常在英国广播公司“轻松节目”里听到的超前了很多。……年轻人摇晃着一只肩膀或者瞪着眼,就像汉弗莱·鲍嘉那样不顾一切地跨过一堆管状折叠椅。^②

点唱机男孩所迷恋的,是“一种特别单薄和苍白的消遣形式”^③,“他们形成了一个情绪低落的群体,一个绝非典型的工人阶级民众的群体”^④。在霍加特看来,点唱机男孩并非少数玩物丧志的孤例,他们代表了 20 世纪 50 年代更普遍的文化-精神症候。即是说,美国通俗文化在工人阶级群体中强势蔓延,以至于成为一种危险的致幻剂,它将使工人阶级青年“生活在由一些简单元素构成的神话世界里”^⑤,而丧失其本应拥有的美德和活力。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405~406 页。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295 页。

③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295 页。

④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296 页。

⑤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295 页。

如果说,点唱机男孩是一种缺乏斗志和能动性,在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面前卑躬屈膝的青年形象,是“一个头脑僵化的阶级中漫无目的和驯服的农奴”^①,那么,另一类较少被深究的形象——“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则展现了工人阶级中部分“不安现状者”在变迁社会中更复杂的精神境遇。奖学金男孩对自己原生的工人阶级家庭有所不满,渴望通过读书、考试、升学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处境,进而跃升为新的中产阶级。在这种奋发向上的过程中,他势必与自己的家人或同伴产生诸多分歧,并逐渐“在情感上脱离了自己的阶级”^②。然而,当他以“获取奖学金”为渠道而远离原生文化群体时,却无奈地发现,自己无法如想象中一般顺利适应新的生活,甚至在很多时候,自己奉若至宝的那套“通过努力学习达成目标”的法则已再无用武之地:

他在那种社会里感到不愉快,它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幅混乱图景,它庞大而枝蔓,没有限度、秩序和集中的热点;在其中没有准确地把苹果棒棒糖给予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甚至也没有给予最有才智的人:但在其中,令人不安的、无法估量的事物,如“性格”、“纯粹的运气”、“相处融洽的能力”和“大胆量”,都具有让天平倾斜的方法。……他只梦想着出人头地,但不知怎么却不是以那个世界的方式。他既对完全接受那个巨大世界的价值观感到不安,也没有从对它们的坚定批判中得到情感上的补偿。^③

奖学金男孩处于在两个圈层之间摇摆不定的尴尬状态,他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无根可寻的性质”,一种“再也不属于任何群体的感觉”。^④故而,他时常为自我怀疑、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的消极情绪所左右。透过奖学金男孩及其“无从安置”的精神困境,不难见出个体诉求与现实秩序在时代变动中更富戏剧性的纠葛。饶有趣味的是,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中国,在那些背负着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而只得在大都市奔波打拼的青年人身上,似乎能找到对奖学金男孩的些许微妙回应。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297页。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347页。

③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355页。

④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348页。

霍加特“自下而上”的研究姿态,以及对个体经验的高度关注,已成为伯明翰学派的鲜明品格。无论霍尔对索尼随身听的“文化循环”过程的考察,^①汤普森对粮食骚乱、卖妻交易、喧闹游行等18世纪英国平民社会之“共有习惯”(customs in common)的梳理,^②还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对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如何对抗社会再生产机制,并由此踏上“子承父业”之途的揭秘,^③皆体现出对霍加特思路的某种接续或推进。霍加特的思路于今日中国学界亦不无借鉴。近年来,在所谓“政治实用主义”的驱使下,不少学者习惯于从预设之观念出发,对原本充满变数的文化现象加以“一刀切”式的附会和裁断。久而久之,很多人一谈到时装模特,便必称“男性目光的凝视”;一谈到工厂流水线,便必称“对身体的塑造和规训”;一谈到星巴克咖啡馆,便必称“消费主义和文化殖民的表征”。上述做法往往使研究沦为自说自话,而无法得出真正有阐释力的答案。在此,霍加特的思路无疑能带来重要启示,它将引导研究者远离缥缈的玄思,而重回当下中国的特殊情境,重回血肉丰满的经验根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涌现出海量的青年亚文化现象,随之而涌现的,是海量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如恶搞、佛系、耽美、腐女、宅男、丧文化、污文化、雷文化、饭圈文化、锦鲤崇拜、小清新、重口味、二次元、女汉子、文艺青年、田园女权,等等。在这些缤纷错落的文化景观中,蕴含着五味杂陈的社会心态,其内涵之复杂丰厚,绝不亚于霍加特所津津乐道的点唱机男孩和奖学金男孩。故而,如何从上述光怪陆离的现象入手,以探寻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转变,或者如学者周晓虹所言,如何使这些看似个体化的经验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观景之窗”^④?这是霍加特留给我们的难题,亦是中国文化研究有待上下求索的长路。

① 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伟译,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参见〔英〕E. P.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沈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③ 参见〔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④ 周晓虹等:《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页。

三 读书识字之用：文化研究的反思意识与批判潜能

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自我建构潜能。他以 20 世纪 30 年代工人社区中广为传唱的歌曲为例，说明工人阶级所普遍拥有的“吸收和改编新素材以满足自己既定兴趣的能力”^①。尽管如此，霍加特依然对工人阶级文化所面临的威胁忧心忡忡。作为通过奋发向学而改变命运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具有“边际人”（marginal man）的身份特征，其思想亦时常表现出两歧性：一方面，他并未以极少数“天选之子”自居，而是对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工人阶级群体深怀眷恋；另一方面，从利维斯夫妇那里得到的知识训练，以及学成后从事成人教育的特殊经历，又使他深切感受到工人阶级在精神层面所存在的隐患或缺失。

霍加特观察到，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包括街头小报、女性杂志、家庭周刊、连环漫画、连载小说、电台广播、流行歌曲、电视“肥皂剧”、电影奇观、美女图片等在内的大众文化，在英国已然呈泛滥之势。他犀利地指出，大众文化所裹挟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走马观花的表演和间接体验的刺激所产生的一种幻象”^②。在这样的世界中，工人大众往往表现得孱弱而消极。霍加特强调，大众文化的最严重威胁，并非降低工人的品位，而在于“对品味的过度刺激”^③，使之变得麻木、迟钝。换言之，大众文化将导致工人阶级（尤其是青年一代）沉湎于稍纵即逝的浅薄快感中，丧失其与生俱来的激情、活力和阶级品格——前文中点唱机男孩的颓废举止，便有力证明了大众文化的精神剥夺作用。霍加特的论断让人不禁想到“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主张。在阿多诺（Theodor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人眼中，大众文化是“一种贬值的、浅薄的、表面的、人造的和标准的文化”，“这种文化削弱了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力量，并向知识分子对文化趣味的仲裁挑战”。^④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似乎沿着两条不同轨道前行，但霍加特对大众文化的警醒，却暗示了二者在某些基本立场上的微妙契合。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187 页。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293 页。

③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 239 页。

④ [英]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 27 页。

霍加特不无遗憾地谈道,大众文化的风靡将“导致平庸和毫无价值之物无穷无尽地涌出”,最终使人们陷入“一个畸形和旋转着的无差别化的世界”。^①面对大众文化所带来的精神荒漠,工人阶级似乎并无多少抗拒之力。基于此,霍加特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读书识字”(literacy)。这一方案印证了霍加特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亦彰显了文化研究一以贯之的反思意识与批判潜能。

从词源学考察, literacy 的渊源可追溯至拉丁语 *littera*, 意为“书写”、“字母”或“识字的人”。^②此后, literacy 的所指有了一定的扩展,即在通常所说的“读书识字”之外,还可用于表示掌握特定知识的素养。如在美国学者赫希(Eric D. Hirsch)的代表作《文化素养:每个美国人应当知道什么》(*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中, literacy 主要指对人类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信息——所谓“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的分有或共享。^③霍加特在上述两重意义上对 literacy 加以使用,并试图赋予其更复杂、深邃的内涵。

对工人阶级而言,基本的读写能力不可或缺,它是广大工人摆脱暗哑无声的窘境,进而认识社会、表达心声的前提条件。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观察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工人阶级在读书识字方面的能力已有了显著提升——在20世纪30~50年代,报刊发行量的连年增长,便充分证明了他的判断。^④然而,霍加特敏锐地指出,单纯的识文断字只会消除一般意义上的文盲,而有助于工人阶级实现更充分的精神解放。相反,倘若一旦学会阅读,便不加取舍地对一切可读之物照单全收,这只会使工人大众被那些“几乎全是耸人听闻和制造幻想的读物”牢牢俘获,并不由自主地“切断一切关于责任和义务的严肃联想”。^⑤霍加特最初想要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阎嘉译, 第236页。

② P. B. Gove 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Springfield: G & Merriam Company, 1961, p. 1321.

③ 参见 E. D. Hirsch, Jr., *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New York: Vintage, 1987。

④ “从1937年到1947年,全国和地方日报的总发行量增加了50%——在同一时期里,周日报纸本身的总发行量几乎翻了一番。杂志和期刊在1938年的发行量是大约2600万份,而在1952年则很可能超过了4000万份。1947年到1952年,全国早报的总发行量增加了50万份,而周日报纸的总发行量则增加了近250万份。”参见[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阎嘉译, 第389页。

⑤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阎嘉译, 第277~278页。

将此书命名为《识字的妄用》(*The Abuses of Literacy*), 原因正是在此。^①

不难发现, 霍加特实际上对“读书识字之用”有更深入理解。他这样说道: “获取知识经济障碍大多已被消除, 但仍然存在一种斗争——无视大量琐碎、虚构的危险诱惑的声音。”^② 霍加特的言下之意是, 读书识字的最重要功用, 不是通过阅读而获得快感, 而是引导人们在阅读中不断反思、体悟, 逐步从认识上升到素养的高度。这种素养不限于对知识的普遍分有, 而是更多聚焦于向纵深处开掘、勘探的能力, 即“对词汇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能力、推断深层含义的能力以及表达更加复杂思想的能力”^③。换言之, 人们不仅要阅读文本, 还务必要学会读懂文本, 由此揭开其纷纭多变的表象, 暴露出隐微难察的深度真实。多年之后, 霍加特对这种基于读写能力的素养有更明确界定, 他提出, 应通过对工人群体的塑造与教化, 使之具备自觉的“批判素养”(critical literacy)。唯其如此, 工人阶级才能保持冷静的反思和理智的判断, 进而“读解出存在于语气、选择、随性而定的错误主张, 以及其他事物之中的欺骗性”^④。

在一次纪念《识字的用途》出版 40 周年的访谈中, 霍加特结合身边的事例, 对批判素养的独到之处作出了详尽阐发。他谈道, 自己的小儿子在一所继续教育学院工作, 这所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都是 18 ~ 19 岁的黑人青年:

他注意到学生们走进教室时, 大都带了一个大音响。所以他买了最近一期《Which》(消费指南)杂志, 是对大音响的调查。这期杂志提供了关于音质、外型、音量等信息, 上面还有图表。他给每个学生一份复印件, 说: “好好看看, 我会对你们想知道的都进行解释。”他们以前从未看到图表, 也从未想过比较商品质量。他们仅仅是跟同伴赶时髦, 并非出于压力, 而是随波逐流。要不就是听从广告, 或看橱窗而动心。所以这种教育是一种启示, 在一个到处都是巧舌如簧的公

① 参见 Jim McGuigan, “Richard Hoggart: Public Intellectu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 12, No. 2, 2006, pp. 199–207.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阎嘉译, 第 379 页。

③ [美] 斯蒂芬·阿普康:《影像叙事的力量: 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马瑞雪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第 32 页。

④ Richard Hoggart, *Between Two Worlds: Politics, Anti-Politics, and the Unpolitical*, London: Aurum Press, 2001, p. 195.

关人员的社会,你可以做决定。一个男孩站起来说:“见鬼,我受骗了。”这就是活生生的批判性文化知识,它刚刚开始。^①

正是在批判素养的充实下,工人阶级才能对琳琅满目的大众文化产品予以权衡、取舍和辨析,进而揭示资本与权力在其中的隐秘媾和。由此,不难窥见读书识字在霍加特心目中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读书识字是批判素养的基础,倘若未掌握最基本的读写能力,批判素养将有如空中楼阁而无法兑现;另一方面,批判素养是读书识字的最重要功效,亦是其延展与升华。借由批判素养的激发,工人大众将有机会“利用和依靠基本识字能力产生出来的社会变化”,^②即通过对周遭世界的反思而建构其立场、态度和“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以积极、独立的姿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

在此,霍加特昭示了文化研究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法国学者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曾谈道,理论之要旨并非精湛玄奥的思辨,而是对常识或惯习的强烈挑战,是一种“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正义”的“论战的精神”。^③同样,基于从“读书识字”到“批判素养”的建构之途,霍加特雄辩地证明:作为以实践性和革命性为标志的理论形态,文化研究绝非对现实的苟且或默认,而是时刻显露出反思与批判的锐利锋芒。文化研究的职责,是充当“衡量真理之有用性和知识之有效性的尺度”,它将逼促人们审视看似理应如此的日常生活,从中发掘出隐而不现的话语策略和权力纠葛,并逐步获得“打开新的、至少是想象的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能力”^④。或者如霍尔所言,文化研究需要不断制造“有重大意义的断裂”——“陈旧的思路在此处被打断,陈旧的思想格局被替代,围绕一套不同的前提和主题,新旧两方面的因素被重组”^⑤。

① [英] 马克·吉普森、[英] 约翰·哈特雷:《文化研究四十年——理查·霍加特访谈录》,胡谱中译,《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②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398页。

③ [法] 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9页。

④ [美]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郑飞燕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26页。

⑤ [英]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1页。

霍加特的思考于当下中国无疑有振聋发聩之效。今天，大众文化对国人已形成围追堵截之势，其手段之高妙、后果之猛烈，远胜于霍加特曾为之悲叹的、徒有“空洞的快乐”的“千层酥文学”。^①环顾周遭，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笔下“24小时不眠不休”的消费主义已不再是新鲜事，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在赛博空间中的强势结盟。当我们乐此不疲地刷着抖音时，当我们盯着华农兄弟“花式吃竹鼠”的视频傻乐时，当我们在朋友圈向往“诗和远方”时，当我们在社交平台为某个“小鲜肉”撕得不亦乐乎时，我们已愈发无可自拔地沉陷于消费意识形态的罗网之中。在此背景下，霍加特对“读书识字”和“批判素养”的吁求显得意味深长，它有助于我们“检视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所有层次上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关系”^②，由此形成一种审慎的、有节制的消费意识，而不致如英剧《黑镜》（*Black Mirror*）中靠踩单车换取点数的芸芸众生一般，被资本和欲望所驱动的巨大机器无情同化。不难预见，这种清醒的批判理性和敏锐的自反精神，还将在文化研究的版图中产生更有力的震荡。

结 语

综上，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霍加特从如下几个向度开启了文化研究的进路：首先，基于对工人阶级生活中“诗意的粗鄙”的描画，霍加特为文化研究对日常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关注赋予合法性；其次，通过对历史演进过程中“闪光的野蛮”的呈现，霍加特为文化研究对变迁视域下个体精神困境的考察奠定基调；最后，借由对“读书识字之用”的追问，霍加特还为文化研究增添了反思与批判的浓厚底色。诚然，文化研究在现今已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层次和形态，但毫无疑问，霍加特所昭示的方向仍将在不同情境下以不同方式被反复演绎。

诚然，作为文化研究在初创阶段的一次尝试，《识字的用途》依然不乏含混或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综观全书，不难提炼出一系列有待深究的问题：霍加特对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生活的回忆是否太过理想化，是否有为反衬当下而“为过去镀金”之嫌？霍加特对点唱机男孩所代表的青年亚文化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第278页。

②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56页。

是否过分悲观，而忽视了隐含其中的对抗、颠覆、挪用，乃至“创造性重写”的强大潜能？霍加特对“新”“旧”两个时代的想象，是否陷入了刻板的二元模式中，而遮蔽了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当霍加特细数工人阶级的精神症候，进而强调教育和素养的重要意义时，是否又反讽地回到了自己深感不满的利维斯传统中？以上问题，一方面应归于文化研究在起步阶段的青涩，另一方面，亦关乎霍加特自身作为“边缘人”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但必须承认，对当下蓬勃生长的文化研究而言，《识字的用途》无可争议地充当了“巨人的肩膀”，充当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起点。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识字的用途》中文版的翻译者阎嘉教授，正是他在不同语言体系、思维方式、文化特质之间的精彩转换，这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进入了更多学界同人的视域中。